

逆境中决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宣传政策制定及其调适

陈 龙

摘要：革命政党要改天换地，必须经得起胜利与挫折、高潮与低潮、顺境与逆境的考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革命的半途伴侣”背叛革命所带来的紧张状态和生存危机，以及党内前路不明、士气受挫、宣传鼓动“尤其减少”的诸多问题，针对性地制定了以报刊恢复“上层宣传”、争夺革命话语权，以支部推动“基层鼓动”、争取革命群众的宣传政策，掀起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高潮。随后在全国暴动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宣传工作两度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在日军侵略中国、国民党派系攻伐的变局中，围绕民众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需求，通过密集发表宣言弥补报刊的缺位，汇聚起进步力量的舆论洪流。历经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熟稔了在逆境中决策，使宣传政策在一致性与灵活性之间更具张力，宣传工作由“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人的运动”得以“领导中国思想战”，标志着党的宣传政策水平日趋成熟。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宣传工作；政策科学；逆境决策；群众鼓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2-00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024)

革命，从来不是一片坦途。要改天换地，革命政党必须经得起胜利与挫折、高潮与低潮、顺境与逆境的考验。政策科学将后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逆境作为一种社会紧张状态，容易显露“政策制定的缺陷……认识和消除这些缺陷和弊病正是政府决策机制和政策制定能力提高并引导社会进步的关键”^{[1]序言X}。“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2]1298}，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生的革命政党，提高政策水平对于实现自身目标尤为关键。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通过强化政策的“一致性”促使全党宣传步调一致，实现了政策方面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的快速突破，加之有共产国际指导、与国民党合作等有利因素，这些政策在政治宣传方面收到效果，但尚未受到严酷现实的充分考验。革命“不是做文章……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17}，当革命处于顺境时，“做文章”的政策有助于壮大声势，在逆境时却难以扭转危局。国民党“二大”后，党内反共逆流潜滋暗长，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宣传“赞助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缺乏因应时局的灵活性，导致“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国民党“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4]466}未能挽回大革命走向败局，开始反思自身的宣传政策。

逆境意味着风险，也会激发政党“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5]76}。在“革命的半途伴侣”^{[6]1102}相继背离后，中国共产党必须独自踏上前路，直面革命必须经历的残酷考验。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加紧实行白色恐怖，致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果损失殆尽，受制于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减少，几乎等于零”^{[7]35}。当革命处于顺境时，难免会产生“只要规定党的正确路线，当众宣布，用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发表出来，并一致通过，就是以胜利自行到来”的

错觉,但在逆境之下才能深切意识到“所谓自然而然的到来,这当然是不正确的”^{[8]251},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政策执行创造条件,避免其沦为空文,并使之契合各地实际,接受实践检验,还需要破解组织受到迫害转入秘密状态后,更需要扩大宣传以维护自身正当性的困局,这些都成为宣传政策制定的难题。

传播是“意义和权力的关系消长”^{[9]前言8},许多西方学者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崛起掌权,根源在其领导下,中国民众在日本侵华过程中的“战时觉醒”^{[10]ix-x},其政治动员最初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人的运动,而最终胜利是在为了民族生存而展开的战时斗争中取得的^{[5]75}。侵华日军亦承认,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思想战的主体,在思想战上日本已输给这一对手。^[11]要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走出“到处只见反革命派攻击和污蔑本党的宣传和鼓动,而不看见本党的答复”的困境^{[7]35},取得“为民族生存”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政治号召力,必然要经历巨大转变。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逆境中决策,找到宣传工作的出路?又如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一致性”与“灵活性”的动态平衡,使宣传工作在不同境遇下顽强展开?解答这一问题,无疑是揭示其历经“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12]1487}的过程,最终走向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

一、控制逆境局势:调整宣传工作的顶层设计

当陷入逆境时,组织首先应当控制逆境局势,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秘密状态,报刊几乎全被查封,党内出现了“不知所措,在经受过遭受严重失败后所特有的那种失望和摇摆不定”的情绪^{[13]165},而“一般民众都为报纸及反动派的宣传蒙蔽了,对政局都有点莫名其妙,甚至竟被反动派愚弄了”^{[14]60}。在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果断发出政局宣言,宣告“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将其作为“本党改变政策之开始”,同时“国际方面又有电令来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15]3}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将转变宣传工作作为政策调整的起点,也即将在宣传方面出台新的政策。

对政策进行调整,首先要明确政策目标,这决定着政策的基调与走向。国民党背叛革命,致使中国共产党势必调整此前宣传以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基调,向党内和社会各界重新阐释“谁是敌谁是友”的问题。此外,国民党攫取政权后,如任由其“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6]55},会持续削弱本党宣传工作的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回顾国共合作的历史,阐明国民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有广大被压迫的民众的支持,而非国民党领袖的外交抑或军官的善战,得出了国民党屠杀工农群众就是背叛革命的结论^{[17]199};明确宣示“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17]207},将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将自身与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区别开来,进而与其争夺革命话语权。可见,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自身陷入逆境的根源在于国民党滑向革命的对立面,故而放弃了以宣传改造国民党的长期政策,以及重建“左派国民党”和利用国民党旗帜进行暴动的短期对策,转为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面目,以人民性消解其“合法性”。显然,这种宣传政策的重大转变,必须通过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方能实现。

政党要获得人民性的加持,需满足三个条件: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普遍原则,人民觉悟到自身已被代表的事实,以及关键的代表角色的行为和被代表事物的利益达成一致^{[18]476}。在诸多宣传手段中,宣言最能代表党的立场,并被最大范围地传播,为了及时向社会各界表明本党主张的转变及其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重点对改进宣言工作提出了具体举措,要求全党考虑不同宣传对象

的实际情况与需求,转变此前以我为主的传播关系^①;考虑不同宣传主体、不同层级采取口吻与内容的区别,推动宣传内容的对象化,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人民利益。就主体而言,党发出的宣言应当比以群众口吻发出的宣言更加直接,以指示民众目前的出路与应有的要求。如果最初某些群众尚不能完全接受党的宣言指出的要求,至少应该使其接受以群众口吻作出宣言的要求。就层级而言,各级组织宣言的原则和态度不能超出中央宣言的范围,但必须依据当地事实将其转化为更具体切实的口号,使党的要求变为民众自身的要求,由民众自己发表出来,由口号而变成行动。对于传单、壁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等宣传手段,亦要求“不限定用 C. P. 的名义,最好用民众团体的名义”^{[19]274}。使党的主张更贴近人民需求,成为宣传工作的基调与走向。

“政策制定重建得以‘执行’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机构化。”^{[1]255}面对全国一切反动势力“由实际上和理论上联合向本党猛烈的进攻”,而党的报刊损失殆尽,“更加谈不上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和鼓动”的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对宣传工作的“忽视若不急起纠正,则将陷党于更大的损失”,将其定位为“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的条件”^{[7]35},加快重建宣传工作。面对复杂政局和各地实际,中共中央强调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但也承认中央层面只能作出原则性规定,“其他须等各地自己根据客观情形去决定”^{[20]40},尝试通过决策权下放,减轻自身决策压力、增强政策的灵活性,避免决策失误损害自身权威,这就要求中央必须与地方分享决策信息、增强情报供给,重建并增强报刊工作就自然被列入日程。

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就着手对党报工作的机构与职责作出顶层设计,将按期出版政治机关报、建立秘密交通机关作为中央的主要职责,将“扩大党的政治宣传的影响并铲除国民党在群众中的余毒”与“确定并创立各地对出版品的分配与翻印之计划”列入中央工作计划^{[21]719},并专设中央党报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予以推动,要求各级相应设立出版和交通机关,构建全国发行网络,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一切宣传品。会后,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两份通告,将其细化为工作举措。其中《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要求,中央常务委员会主编对内刊物《中央通讯》,解释党的政策、批评党的错误、讨论党内问题,各级党部都须出版类似刊物,采用油印出版;恢复出版对外刊物《向导》(实际另行创办了《布尔塞维克》),各省委及以下各级党部如力所能及都应出版鼓动性质的机关报,印刷手段因地制宜。《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关于出版分配)》要求^②,各省委在秘书处下设出版分配股,发行一切党的刊物,并与中央出版科发生直接的关系,使党的刊物在群众中发生实际效益。

这一时期出台的宣传政策,中共中央都为各级组织落实提供了示范与标准,通过调整政策目标、改进宣言工作和重建办报体系,向社会宣告自身没有被赶尽杀绝、仍在浴血奋战,令群众为之欢欣鼓舞,“胸中许多块垒为之大消,似乎从此又有了明灯了”^[22],为控制逆境局势准备了社会舆论。

二、调动全党力量:推动宣传工作的经常运作

当陷入逆境时,组织还应当迅速调适,使自身运作尽快恢复正常。重建报刊工作体系,只能应对白色恐怖下无法发声的问题。攫取政权后,国民党吸取此前不重视宣传的教训,根据宣传工作散漫且不统一的状况^[23],构建起中央宣传部统领下,指导党报委员会负责的党报网,以及遍布全国的通讯网和广播网组成的庞大宣传体系来争夺群众,强化自身的“合法性”。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缺乏“经常的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一切文字、刊物、传单、口头等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临时的、无常的,而且是偏于从上而下,没有深入群众的”,“反应敌党的宣传非常迟缓,甚至忽视敌党的宣传”,^{[24]615-616}导

^①根据对中共中央宣传政策的文本分析,除“中国共产党”一词之外,大革命时期出台的相关政策中,表示宣传主体的“我们”一词的词频位列第9位,而代表宣传客体的“群众”位列第11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关系则发生了翻转,“我们”位列第19位,而“群众”位列第2位,“民众”位列第13位,反映出其决策视角的变化。

^②据《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该文件的发布时间为1925年12月13日,但根据该文件对革命形势的描述,以及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才明确规定“各省应设省委员会”,取代此前的区执委,作为省级最高领导机关,可判断其发布时间应为1927年12月13日。

致“资产阶级这些企图的确得了相当的成功,尤其是欺骗群众的改良宣传,的确增加了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工农群众对他的幻想”^{[25]2}。过去对国民党形成优势的宣传工作,却陷入了被动甚至危险的局面。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将革命目标由“反帝反封建”调整为:“第一,消灭地主阶级,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第二,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第三,武装暴动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26]582}。这要求不能将宣传局限于报刊工作,而应当扩展宣传工作体系,从更大的社会网络中汲取力量,前提是推动宣传工作的经常运作。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强调“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地领导,如果仅仅高级党部定几个空架子的计划,发布几种宣传的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究没有接近的时候。”^{[27]709}在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还专门制定了《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从中央到支部都应当经常地开展宣传工作,强健各级党部的宣传机关,省委立即建立宣传部,地方党部等也应有宣传组织,支部设宣传干事。^{[28]272}要推动宣传工作的经常运作,建立各级宣传机关并进行发表宣言主张、制定大纲计划等“机关式”的工作是必须的,但要真正影响群众,必须直接与群众接触。这些政策明确指向整合全党力量,推动宣传工作体系在横向上向群团组织扩展,在纵向上激发支部作用,以增强其覆盖面和动员力。

权力是机构运行的核心要素,涉及决策、执行和监督等诸多方面。要使新的制度设计发生实际效力,必须赋予宣传机关相应的运行资源。由于各地存在较大差异,中共中央着手下放决策权力,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在此前“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的条款基础上^{[29]145},强调各部委受同级党委指导并有权作出自己的决议,将各级组织的部分政策资源下放到其部委,使之能够较为独立地经常运作,改变宣传工作“建筑在上级指导机关”的现象^{[30]38}。基于“从组织方面来说,我们的党还不是群众性的党:我们只是在全力以赴地向这个目标靠近”的判断^{[31]84},争取革命群众成为党的中心工作,中共六大也专门出台了宣传员制度,规定每逢新的政治运动兴起时,各级组织应立即召集宣传员会议,指示实施运动的方法、内容、形式,供应必需的材料,在农村和城市利用各种形式实地鼓动群众。这些政策推动宣传工作在各级组织既有部门推动也有专人负责,不仅通过宣言、报刊等大众传播手段间接影响群众,也通过作讲演、发传单、贴标语等街头传播手段直接触达群众,解决宣传“偏于从上而下,没有深入群众”的问题^{[24]616}。

赋权与监督,是加快政策落地的一体两面。要确保政策的执行,“必须有一套严格的工作制度,特别是检查、巡视、总结制度。只有布置,没有检查,巡视、总结,也得不出成绩缺点,经验教训,教育全党,是会丧失领导机关权威的。”^{[32]314}中共六大细化了工作报告制度,要求各地每月向中央报告本月工作情况和下月工作计划,内容包括党员训练班和工人补习班、鼓动口号、宣传品和报刊发行、民众对政治纲领的反映和对宣传工作的影响,利用哪些机会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各县市宣传工作的^{[33]238-239},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如果“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34]480}。由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层面完成了宣传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的闭环,通过制度压力推动各级宣传工作运作起来。

三、强化基层鼓动:以机制调整争取宣传空间

当陷入逆境时,组织应当减弱其破坏程度,尽量减少自身损失。革命政党的力量来源于群众,但反革命的政党不会坐以待毙。北伐结束后,国民党凭借执政优势掀起宣传攻势,极力在群众中扩大改良主义的宣传,致使中国共产党陷入公开发表主张可能导致组织被破获、报刊被查禁,不开展政治宣传又会被消解革命话语权和政党正当性的两难境地,故其意识到“现在在中国,宣传鼓动工作具有最重要的意义”^{[35]77},但每一次发起的宣传攻势不亚于一场火线上的战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上层宣传、基层鼓动”的宣传工作机制,此时“上层宣传”受限,就必须在“基层鼓动”中打开

局面,通过调整宣传工作机制,与国民党展开“贴地搏杀”的宣传战。

在“上层宣传”方面,为减少党的机关公开发声的风险,中共中央降低了就政局发表宣言的频率,但如何使各地得到中央的及时指导,成为维系政党的难题。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中经常可见此类表述:“中央和苏区……还未能建立起固定的联络线。直到现在,同志们去那里像发送材料一样还是英勇行为,大体只有40%能成功。”^{[36]109}部分省委历经数月才能收到中央文件,甚至出现执行过期决议的现象。^{[37]281}在此困境下,传递方式多样、易于伪装、影响广泛的党报被寄予厚望,中共中央将其定位为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鼓动、说服、组织群众的利器,要求党报的文章不仅具有最高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具体性,还应当尽可能的通俗化,真正深入劳动群众^{[38]315}。为使全党对这种重大调整形成共识,党的领导人相继发表了《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怎么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怎么建立健全的党报》《列宁主义与党报》等文章,在阐述政策的同时引导党报向“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方向前进^{[39]18}。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与施行,为党报在逆境之下承担起新的重要使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要使政策不停留在纸面,必须为其实施提供相应的条件,尤其是如果不改革执行机构,那么政策愈是具有创新性,它得以执行的可能性就愈小^{[1]197}。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决定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中央党报,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实话》《布尔塞维克》《党的建设》的主笔组成中央党报编辑处,加强对党报编辑工作的领导,强调各级组织应当将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划分清楚。为解决中央党报多散布在上层机关,“很少传布到下层组织中去,更少散布到群众中去”的问题^{[40]74},加快建立全国党报发行网,将中央组织部下的发行科升格为中央发行部,负责中央党报的发行、印刷工作,省委、区委相应成立发行部(或科),各级党部经过党团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发行系统。为解决此前党报没有指导实际工作、总结斗争经验、发展党内讨论的问题,决定建立中央党报通信网,要求各级党部负责人必须承担起经常给党报撰写文章的政治任务,各级党部必须为中央党报建立通讯网并指定专人负责,在工厂、矿山、企业、学校、乡村中训练组织工农通讯员,每星期报送2篇工农斗争通讯。组织机构的增加,意味着党组织的活动空间在不断拓展,涉及的工作面也越来越宽,其规模亦成倍地扩大^{[41]25}。中共中央在短短三个月内连续出台4份报刊工作政策文件^①,通过成立一批工作机构,在编辑、发行、组稿等方面调动全党力量,为党报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组织保障。雷利斯基曾评价道:“我们党只是在需要出版书报时才很好地进行工作”^{[42]321},既表达了对报刊工作的肯定,也对加强群众工作提出了期望。

在改造党报的同时,中共中央转变了对各级组织的领导方式,强调过去对各地的指导,偏重于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示信等,今后将偏重于运用党报进行政治上的活的指导(重要工作指示仍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发出)^{[43]133},使党报成为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群众的组织者,扩大党对群众的影响的有力工具,要求“自中央委员会以至支部的组织,必须将党报看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关”^{[44]37},全体党员应根据党报的分析与指导来讨论工作,纠正过去依赖和等待通告指导的习惯^{[45]385}。从数据看,中共中央表现出极大决心:自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第一份通告以来,中央通告编号至103号。1926年7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中央通告重新编号后,到1931年1月中央通告编号至96号、中央通知编号至204号,此后此类文件再未发布,而党报党刊刊登的文件不断增多,并通过“从党的立场来记载一切消息”实现“活的指导”,成为“党的党纲、党的政策的直接的宣传者”^{[46]336}。

在“基层鼓动”方面,共产国际提醒中共中央:“考虑到可怕的恐怖会给在工人群众中散发党的报刊书籍造成困难以及多数工人很少识字的情况,党应该着手出版只写一句口号的短小传单……篇幅

^①这四份文件包括1931年1月21日发布的《中央通知第二〇三号——改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1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3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

小的传单便于印刷百万份,容易散发和使识字不多的工人们看懂。”^{[47]537-538}除了内容的通俗化之外,一种思想“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生重要影响的”,必须经历“将相对复杂深奥的思想一阶一阶地降”的过程^{[48]7}。以中共四大为界,前期党对于“宣传”与“鼓动”是并列使用的,多数场合使用“宣传”这一词语,之后“宣传”与“鼓动”才逐渐被区分开来,前者趋于面向上层开展政治宣传,后者则面向基层,引导和发动劳动群众进行实际斗争。要使“基层鼓动”打开局面,不仅要在内容上加强供给,还要在组织上优化架构。正如共产国际提到的,口号在鼓动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作为一种政治权威的符号化过程,如果在对事物符号化的同时将其纳入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体系之中,那么传播者只需发出若干概念符号,就可能得到受众的条件反射^[49],无论是标语、传单、歌曲等都由此转化而来,亦可作为谈话、演讲、集会等的核心内容。为了将鼓动的口号与宣传的口号区分开来,使党的号召在群众中产生实际影响,中共中央专门指示宣传的口号要根据党的政纲和总的路线来决定,而鼓动的口号要以群众的实际要求来决定,根据群众的痛苦提出具体的口号,才能使广大群众了解,进而起来斗争^{[50]120},全党必须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在一切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中开展工作,抓住每个实际问题,提出鼓动口号、解释宣传口号,使群众拥护党的政治口号。通过宣传口号、鼓动口号、行动口号等逐阶下降、层层递进的过程,“使群众自愿地为实现这个口号来争斗”^{[51]845}。

话语改变统治斗争,并使斗争因为它、借助它存在^{[52]49},口号为在群众中进行演讲、召开大会、组织罢工、领导游行、发展讨论提供了核心内容,但“限制型编码的预设是共有经验和集体认同”^{[53]142},没有空间上的共同在场就很难有精神上的心照不宣,必须在组织上也进行相应安排。为使宣传深入群众,中共中央推动支部成为宣传鼓动的基本组织,明确其职责是将上级党部的宣传鼓动口号具体化、实际化,创办定期发行、通俗易懂的工厂小报,训练工农通讯员使党报通俗化,审查指导每个同志的宣传工作,从而使上级的政治宣传下沉到基层的群众鼓动中。为避免工作无专人负责而空挂,要求支部必须设置1名宣传干事,负责本支部的政治口号宣传、鼓动口号制定、支部教育工作、工厂小报工作,并定期向上级党部汇报。

国共两党对于宣传工作的谋划表现出,政党应当通过组织网络体系、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他宣传教育手段实现政治动员,促成社会公众对政党、政权和政策的认同和支持^{[54]212},争取群众成为两党交锋的焦点。通过调整宣传政策,中国共产党着手弥补此前上级党组织难以直接调动广大基层党员参与宣传鼓动以及宣传鼓动内容难以触达群众的工作断层,形成大众传播为主干、组织传播为支脉、人际传播为根基的多层宣传网络,以进一步提升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和动员力,尤其是“更有效用”的口头宣传方式的大力推广^[55],为党的主张转化为群众行动提供了关键中介。

四、抓住破局契机:以灵活策略重振宣传工作

当陷入逆境时,组织必须灵活适应各种情况,尤其要善于化危为机。1930年8月,为夺取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胜,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全国暴动,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多以失败告终,积蓄的革命力量在暴露后受到极大损失,十几个省委机关先后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在汉口、广州、长沙、厦门、汕头等地,每个城市的党员人数只有几十人。”^{[56]519}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在改为日报公开发行后也遭到迫害,发行量剧减至千余份,其他白区报刊也逐渐凋零,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陷入“什么刊物都不能出”的困境^[57]。“由于党首脑机关的迭遭破坏”^{[58]652},中央宣传机关工作人员经常辗转避险,造成“工作人员的实际作用,时常更动,以及能力的薄弱,并不能得着很大的成绩”^{[59]139}。可见,逆境之下的决策存在风险,任何失误都可能使过往努力付诸东流,甚至导致局势再度恶化。1931年,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采取“不抵抗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日本媒体则与侵华日军相配合,企图通过歪曲事实将事变责任归咎中国,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为扩大侵略作舆论准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西方媒体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弱化中国主权诉求,强化了日军侵华的决心。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立足“抗日救国”调整宣传政策,

在这场三方角力的政治战中不断积累积极因素,扩大舆论支持与生存空间。

衡量政党宣传效用的关键,在于其引导民众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往往取决于其反映民众意愿的程度。中国共产党从事变中发现扭转局势的契机,指出“‘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60]562},连续发出宣言历数日本侵略者压迫中国、屠杀民众的罪行,批驳国民党“逆来顺受”“镇静外交”的投降卖国政策,揭露其站在全民族利益对立面的事实,并将两者相关联以“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61]398}。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比国民政府早了近十年),以行动展现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立场,进而宣示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进攻苏区与红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工具和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障碍,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领导全民族革命战争,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民众武装。通过逻辑清晰的宣传攻势,中国共产党“言行一致”的表现较之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两个政党、两种政权、两支军队的根本区别不言而喻。

转变力量对比,是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面对占据军事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和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反帝运动统一战线的策略,随之发表的宣言“得到在中外报纸上最普遍的登载,他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对真正愿意武装抗日的红军苏维埃的热烈同情,他使国民党许多军队发出停止剿共和北上抗日的要求,他在实际上逼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自己揭穿‘抗日剿共并重’的假面具。”^{[62]1151}随后正式提出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以推进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民主革命战争领导力量的“三位一体”口号,要求全党通过学者记者联署、报纸杂志刊发、各级组织发声、开展党内讨论、向兵士传达解读等方式宣传《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无力’抗日”“治本莫过于建设”“治标莫过于剿共”等虚伪口号,充实本党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内涵,并将其转化为各个阶层的实际行动,扩大反日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假抗日、真剿共”面目的揭露,致使国民党内部再度分化,为政局转变埋下了种子。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启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党的宣传部门和报刊工作再度陷入停滞。1935年6月,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当局再度与之签订了妥协退让的《何梅协定》。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痛心疾首地指出:“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实行对日抗战”,红军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63]264-265},正式提出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新政策。根据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充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涵并明确其实现形式,为下一阶段的宣传工作奠定了基调。

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64]854}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着手重建宣传工作,将这种威望转化为政治优势。文件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抗日救国的新时期,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各级宣传机关与部门都要一致为党的策略路线而迅速总动员,使宣传工作适合于党的策略路线,适应于夺取更广大的群众,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急剧转变;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形势发展,分对象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及时调整宣传的口号。^{[65]1199-1202}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一度作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决议^{[66]8},但长期的革命实践已证实了“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

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67]58}。为使党的宣传政策灵活适应各地实际情况,中央宣传部随即发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强调策略路线是每一政党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行动的方向和方法,是根据革命任务、各阶级态度、当时革命形势以及主观力量来决定的,故其不是刻板的、不变的,而是有时是进攻有时又是退守的,但总的目标都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强化宣传政策的灵活性提供理论基础。^{[68]25} 中央宣传部的重新运作及其提供的形势分析与工作指引,为在全国范围掀起宣传攻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组织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一经恢复,就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在报刊工作尚未重建的情况下,通过密集向各方发表宣言引导社会舆论,加快促成全面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1月25日,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向张学良等东北军师团长及将士表示不愿自相残杀,而愿与东北军一道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同年,3月1日,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主力红军即刻向山西进发抗日,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达抗日决心。4月25日,向全国各党各派、各报馆、各军队、各工会、各农会、各商会、各学生会、各团体、各会社、各帮各业的全体同胞提议,创立抗日人民阵线,提出共同行动的六条纲领,欢迎各界互派代表共商具体行动办法,汇聚全国抗日救亡力量。^{[69]17-19} 在此号召之下,全国要求抗战的呼声不绝于耳。同时,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通过书信联络进行精准传播,促使张学良、杨虎城决定与红军停战,两广地方势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帜^{[70]154},冯玉祥也发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对外的抗日言论^{[71]68}。在中国共产党有策略的宣传引导下,全民族抗日的大势已成。

乘此之势,中国共产党转变“抗日反蒋”的口号,密集与国民党直接沟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心口号,表明愿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千回百折赴之”,同时与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进行坚决抗争,双管齐下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示:“当着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最后一瞬间,我们已顾不得你们还是对于我们怀着何等深刻的仇怨,还是集中全力向红军和苏区进攻,并在全国各地拘捕杀戮我们的同志,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挽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灭亡”^{[72]43},愿意抛开一切仇怨,与国民党任何组织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携手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同奋斗。同年,8月25日,再次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批评国民党“五大”制定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政策,以及蒋介石关于“我敢说最近的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的言论,未能表达出抗日救国的坚决态度,吁请国民党全体党员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响应全国人民对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盼望,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73]78-79} 虽然这些诚意并未收到蒋介石的积极回应,却感召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其“兵谏”。事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通电,指出这次事变是为抗日救国而产生,主张和平解决,由各党各派各界共商抗日救亡草案、讨论蒋介石的处置问题,^{[74]130-131} 最终实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这充分证明,宣传工作不仅可以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还能够推动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甚至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余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遭遇艰难困苦极为频繁的时期,大革命失败、全国暴动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让宣传工作几乎“归零”,但这是革命政党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经过恢复报刊工作体系控制局势恶化、重建各级宣传部门使之重新运作、调整宣传工作机制减少遭受损失、站在民族大义争夺舆论高点的政策过程,最终走出了白色恐怖和武力“围剿”下的逆境。其间,党多次依靠报刊工作破局,加深了对党报性质与作用的理性认识,对党管党报、党报姓党思想的深化、党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群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思想的提出,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社会普遍政治化

之后,政党体制本身就成为了该社会的政治沟通体系^{[75]65},面对连报刊都不能出的极端困境时,党通过组织传播弥补大众传播的缺位,依靠发表宣言扭转局势,改变了中国的走向。历经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熟稔了在逆境中决策,使宣传政策在“一致性”与“灵活性”之间更具张力,不断驾驭更为复杂的局面。

当然,任何主体都不能确保决策的一贯正确,维经斯基曾感叹:“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76]618-619},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错误决策和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关键在于总结经验与教训,持续提高自身的决策水平,强化自身对时局的判断力、对问题的决断力以及对机遇的把握力。1937年,张闻天在总结十年革命经验时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各种各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各种各式的左倾机会主义。”^{[8]257}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运动、军事、执政过程中遭遇的逆境与斗争,为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了预演,也使自身的宣传政策水平在淬炼中日趋成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政策制定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必须确保党的主张与群众利益相接近,统筹党内资源并广泛凝聚党外力量,依据环境局势变化与地方实际调整策略,构建分层决策机制,善用关键契机破局,在坚守原则基础上持续提升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与人民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这些历史经验对现实工作具有显著启示:宣传政策制定应注重形势研判与区域国别分析相结合,把握政策窗口;坚持政党主张与人民利益相贯通,明确价值导向;通过党的领导与党外动员相协同,强化执行基础;推动中央统筹与地方创新相衔接,确保落实效能。在“东升西降”为长期趋势、“西强东弱”仍为阶段性现实的复杂背景下,宣传工作更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系统韧性、敏锐捕捉时机,核心在于抓住“人心向背与力量对比”这一根本问题,不断为党的政治目标实现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德罗尔. 逆境中的政策制定. 王满传,尹宝虎,张萍,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2] 毛泽东. 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陈独秀. 革命与武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汤森,沃马克. 中国政治. 顾速,董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 [6] 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 [7] 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8]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9] 麦格雷. 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 刘芳,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10] JOHNSON C. A.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11] 赵新利. 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评介. 中共党史研究, 2022(2): 156-157.
- [12] 毛泽东.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7.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4] 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四至八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 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月. 内部资料,1984.

- [1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 八七会议.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 [16] 李普斯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张绍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1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8] 费约翰.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李恭忠,李里峰,李霞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19]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0] 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21] 中共中央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2] 易囊萤. 欢送已脱离共产党的党员. 布尔塞维克,1927(2):25.
- [23] 陈龙. 破解集中与分权之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体系的调整. 传媒观察,2024(3):110-120.
- [24] 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5]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 [26] 中央通告第二号——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8] 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 [29]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0] 中共闽粤赣特委第二次各县宣传联席会决议//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 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1930.12—1935.12.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 [31] 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8.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32]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南工作的指示信//《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 [33] 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节录)——规定各种报告大纲//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上.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 [34]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5] 向忠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电报//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8.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36]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0.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37]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0.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38] 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9] 列宁. 从何着手?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五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0]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41] 黄大熹. 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发展路径的历史考察.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42] 雷里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0.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43]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44] 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45] 中央通知第二〇三号——改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上.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 [46] 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9.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48] 王汎森.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49] 许静. 浅论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 国际政治研究,2004(1):123-130+8.
- [50] 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 [51] 刘少奇. 论口号的转变//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 [52] 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53] 朱国华. 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54] 王邦佐,等. 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55] 尚昆. 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斗争(苏区版),1933(2):9.
- [56]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9.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57] 王学文. 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 党史资料丛刊,1980(3):48.
- [58] 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9]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七——一九三三.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 [60]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3.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 [61]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62] 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 [63]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4] 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致张国焘、朱德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红军长征·文献.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 [65] 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 [66]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7]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陈郁,罗华平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68]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供各级党部讨论时的参考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70]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 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贵阳:贵州人民

出版社,2021.

- [71] 中共居巢区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居巢地方史:第一卷.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 [72]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73]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74]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75] 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 王明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76]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Decision-Making in Adversity: The Formu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ublicity Policy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Chen Long(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 revolutionary party seeking to transform the world must withstand the tests of victory and defeat, ups and downs, as well as favorable and adverse circumstance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ced a tense situation and a survival crisis caused by the betrayal of its “halfway revolutionary companions”, along with numerous internal challenges such as an unclear path forward, a dampened morale, and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publicity and agitation. In response, the CPC formulated targeted publicity policies, which included us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restore “upper-level publicity” and compete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while leveraging Party branches to advance “grassroots agitation” and win over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These efforts ignited the upsurge of the Chinese Soviet movement. Subsequently, following the failures of nationwide uprisings and the Fifth Counter-Encirclement Campaign, which dealt two heavy blows to publicity work, the CPC seize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and internal conflicts within the Kuomintang. Centering on the people's demands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oppose civil war, the CPC compensated for the lack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by intensively issuing declarations, thereby gathering a powerful tide of public opinion among progressive forces. Through enduring hardships and challenges, the CPC honed its 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 in adversity, infusing its publicity policies with greater dynamism between consistency and flexibility. Propaganda work thus evolved from “a threatened movement of a minority” to “leading the ideological front in China,” marking the increasing maturity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policy.

Key words: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publicity work; policy science; decision-making in adversity; mass mobilization

■收稿日期:2025-09-12

■作者单位:陈 龙,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610

■责任编辑:肖劲草